

民族革命戰爭之研究

戰略之研究

漢口大眾出版社刊行



民 族 革 命 戰 爭

的

戰 略 之 研 究

作 A. C.

漢 口

大 眾 出 版 社

1938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

每冊實價一角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作者 C.

出版者 大眾出版社 A.

發行者 大眾出版社

漢口交通路生成南里六三號

生活書店

經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華中國書公司
新生圖書公司

序 言

本書作於「八一三」戰爭爆發之前，目的在於從抗戰的戰略上，指出我們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之勝利的前途。

目前，神聖偉大的戰爭已繼續了半年，並且在軍事上受了小小的挫折，正是一般失敗主義者重新抬頭的時候，我們從戰略的分析上證明抗戰前途的光明，並不是一件徒然的工作。

「失敗是成功之母」，從過去半年間抗戰經驗所給予我人之教訓，在戰略上未能採取運動戰，未能處於主動地位予侵略者以打擊，正是此後急待補救的地方。

所以，本書雖脫稿於「八一三」之前，但其中所指出的戰略問題，和民族革命戰爭中的特點，在戰爭的進行中却愈顯得真實和重要。如何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並不命定的，戰略的運用也是決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最後，謹以此書獻給英勇的戰友之前。

民族革命戰爭的戰略之研究

目錄

序言	一
緒論	一—六
一·運動戰與陣地戰	七—一八
二·外線戰與內線戰	一九—二一
三·進攻戰與防禦戰	二二—二六
四·殲滅戰與消耗戰	二七—三一
結論	三二

緒論

我們不僅從過去和現在的歷史，來指出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前途，而且必要從戰爭具體的戰略，來指出人民應該怎樣對日作戰，以爭取光榮的勝利。

在現在我們的手裏，缺乏着具體的材料，這是我在寫這篇文章時，感到很大的困難，然而依據數年來的中國人民所進行的各種式樣的民族革命戰爭，所指示的一般作戰經驗，在這裏，我們對於這些問題，還是可以作一般的處理的。

橫在我們前面一個最明確的事實，那就是和中國民衆作戰的敵人，他們的武器和經常的一般軍事訓練，都是對於中國民衆方面的，這裏正是指示着我們作戰所遇的困難的地方，特別是關於武器。然而問題不在乎困難，而在乎困難是否可以克服，如何來克服。

過於重視上述這種困難，而且或藉口這種困難，而否認民族革命戰爭的可能的，

不用說他是故意塗抹現在正在進行中的歷史現實，同時那就是掩蓋了這組織戰爭的兩個基本要素，即一方面是那活的人力，另一方面是那爲人力所製造的和使用的工具。這所謂活的人力，指的不是個人的人，而在社會集團的人，工具只有和人力結合的時候，工具才起了效用。人的問題是決定戰爭最後勝敗的問題。誠然，如果某方面握有最好的武器，而人力不爲所用，甚至反轉投到對方去，那末，這某方面只有出於瓦解的一途，那最好的武器却只得轉授給對方，而轉來作爲反對自己的武器了。這裏就可以說明歷史上革命與反革命的戰爭，所以勝利和所以失敗。

人的轉向問題：當然是以自己的利益爲轉向。戰爭的根底就是關於人（社會集團的人，亦即是社會階級的人）的利益。德國著名的軍事學家克拉次維次有以下的名言：「戰爭不僅是政治的行動，而且簡直是政治的真正工具；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不過應用了特殊的方法，以謀政治計劃的實現而已。」然而應該指出的：第一，克氏並未理解政治內容的實質，如恩格斯所說的：「克氏雖然說明了政治與戰略的關係，但却沒有透澈地理解政治內容的實質；」第二，克氏祇了解了政治與戰爭的關係的一方面

，而沒有了解其全面，如列甯所說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而政治在戰爭中，仍然繼續着。」戰爭的本質就是政治的角力。比如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其基本的出發點，就是爲着掠奪殖民地來支持自己國內地主資本家的社會剝削制度；這戰爭只是日本地主資本家企圖延長自己社會統治之政策的所採用的特殊手段，而這戰爭又必反轉而影響於日本社會內部政治的形勢，因而又再反轉而影響於戰爭。

日本的勞苦大衆在這戰爭中是否可以得到利益呢？第一，日本勞苦大衆的貧困和失業（或資產階級所謂「人口過剩」）的問題，決不能由於日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而解決，四年來滿洲的佔領，完全證明了這點；第二，戰爭中的肉體犧牲者，和由戰爭所引起的軍費負擔者，首先就是日本的勞苦大衆，日本勞苦大衆在戰爭的實現中，會認得這種戰爭是與自己的利益無干，而且只能是反對自己的利益，只能是日本地主資本家藉此來反對大衆所要求的社會解放。日本勞苦大衆這種覺悟及其這種覺悟的行動，是存在而且在繼續發展中。從報上，我們不斷地看到日本軍隊中的反帝反戰組織的發露，特別是在東北日軍與義軍的戰爭中，在上海戰爭中，在長城戰爭中，日軍士兵反

戰的情緒，及其作戰的消極，完全給我們以證明。在東北義勇軍抗日的戰役中，日本士兵會自動的供給義軍以消息，槍械，子彈，這差不多就是公開的祕密；日本士兵會自動的供給着帝國主義者的活埋。日本士兵的覺悟，以及日軍內部自己的瓦解，這一方面，要依賴於日本社會內部整個階級鬥爭的發展。只要中國人民抵抗日帝國主義者的戰爭，進行得越激烈，越擴大，就會更加給日帝國主義者以打擊，就會更加促醒日本的士兵，就會更加速日軍內部的瓦解。從以上這些真實事實的發展中，我們完全看到：日帝國主義者雖領有精良的武器，然而日帝國主義者却不能不把這種精良的武器交給日本的勞苦大眾，因為日軍正完全由日本勞苦大眾來組成的。可是這日本勞苦大眾却是反叛日本帝國主義者：當其覺悟到自己的歷史使命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者這種精良的武器，却要變成爲日本勞苦大眾反對日帝國主義者的精良武器。這種覺悟的日本勞苦大眾，那就是變帝國主義侵華的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日本帝國主義者爲着企圖緩和解決自己統治的國內危機，來進行侵華戰爭，却又在戰爭中來進一步地暴露了，擴大了自己的危機，因而埋葬了自己。

和日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相對抗的，爲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中國人民的生存，必要依賴於民族的解放，這是一個淺近的道理。中國人民和日本帝國主義者是真正的死敵，這從九一八以來，中國人民所進行的不屈不撓的民族革命戰爭，就可以看出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這是中國人民爭取自己生存的手段，這種戰爭就是代表着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人民了解：如果中國人民想得到和平的經濟生活和文化福利，想要組織自己真正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合理的社會，則不從帝國主義者——首先是日帝國主義者的鉅蹄下解放出來，那純粹是在做夢，惟其是如此，所以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和日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戰爭，在人的歸向問題上，完全不同，換句話說，日本勞苦大眾不能爲日本帝國主義者效死，而中國人民却願爲自己效死，日軍在日本勞苦民衆覺悟之下，會日趨於瓦解，而中國人民抗日軍隊，却會由於中國人民的覺悟，日趨於堅固。中國人民雖則缺乏了新式的武器，然而，中國人民却有新式的武器的來源：如東北人民革命軍與義軍，如東南西各戰場上的革命隊伍，他們武器的來源，或者是由日軍在人民力量前面的瓦解而取得，或者是由日軍中兵士和下層軍官自覺的供給；中

國人民，包括東北四省和中國本部的，在政治上和在軍隊編制上，最有組織，而且有一般新式的步槍及其它武器的革命武裝，總數至少有兩百萬。這兩百萬的武器，有的是由敵人的手裏取來的。所以問題還不在乎武器，問題是在乎人民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動員之廣泛和深入的程度如何；人民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動員越廣泛，越深入，則敵方的基礎，越軟弱，而敵方的武器，也越容易被中國人民方面所奪取，所吸收。不但戰爭是政治上的繼續，而且戰爭調度的每一個脈膊，都和政治調度的每一個脈膊相呼應，而且戰爭的展開，同時就更加展開政治鬥爭的舞台。

惟其戰爭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上，是不同的政治繼續，而政治又不斷地在戰爭中為新的展開，所以現代中國人民大眾，在其進行最現代的政治鬥爭中，也有着自己的戰爭的戰略，和其政治鬥爭相適應。

在這篇文章中，我想提出如下的民族革命戰爭幾個戰略問題：（一）運動戰與陣地戰；（二）外綫戰與內綫戰；（三）進攻戰與防守戰；（四）殲滅戰與消耗戰。從這幾個問題中，來觀察中國人民民族革命戰爭的一些特點。

一 運動戰與陣地戰

法國大革命時代國防委員會，一七九三年十月八日有過一個這樣的訓令：

「採取堅實迅猛的戰法，現在正是時候。爲着這緣故，必要集中兵力。兵力分散就薄弱。分散兵力，分攻數城，這是從前貴族軍隊的戰法，這種戰法，只有使戰爭延長下去。現在急宜用優勢的兵力，突攻敵人的弱點。這樣，必會得到勝利。」

這個訓令表現了法國大革命國民戰爭的新戰略精神，這種戰略，當時擊潰了內外敵人軍隊的進攻，挽救了法蘭西共和國。

法蘭西大革命所進行的國民戰爭，這種戰略精神，差不多是歷史上一般「弱敵強」的戰爭的一般戰略精神。「用優勢的兵力，突攻敵人的弱點」，這種戰略，正是從來在軍事上的所謂「出奇制勝」的戰略——根據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的發展，每個歷史階段隨

時具體變化的「出奇制勝」的戰略。

亨利在其所著「希特拉征服歐洲的計劃」一書中，曾寫述了以下一段歷史：

「……「卡內」是紀元前二一六年羅馬人和迦帖基人，在阿卜利亞地方的一次歷史戰爭；在那次戰爭中，哈尼巴魯的弱小軍隊，把八萬五千羅馬大軍，這樣一個不可比擬的力量，擊成粉碎。那次所利用的，就是這天才的「集中」戰略，用騎兵從側面截擊和包圍他們的敵軍。」

克拉夫維次，普魯士偉大參謀部的第一個創始人，曾引伸「卡內」的思想成爲一般的理論……這實際上在每次戰鬥，特別在並非勢均力敵的戰鬥中，總是一種自然的基本原則，歷史上一切勝仗所依據的原則。拿破崙，凱撒，和亞歷山大，都是運用特別集中的力量出奇制勝。甚至在軍事學的經典的寓言中，例如，那沒有武裝的小達衛，對於穿盔帶甲的巨人哥利亞，所用的策略，也都沒有不同。」

然而我們應該指出的，克拉夫維次，這一個曾經是前世紀的偉大的軍事學家，他的戰略思想是深受拿破崙戰略的影響的；而這縱橫歐洲大陸，幾乎百戰百勝的拿破崙

軍隊的最好戰略傳統，正是從法國大革命國民戰爭那裏承襲來的。

亨利在其書中敘述了首次大戰時德國參謀部不能很好運用所謂「卡內」的殘障，再特別強調了這種戰略的偉大意義；

「這種絕對集中全部力量，在決定點，實行決定突擊的戰略，曾經是，而且依然是軍事歷史上，弱者對待強者最有效的武器，甚至是在這種情勢之下，惟一可能的武器……」

上述這種戰略，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謂運動戰的戰略。

百年來在中國存在過，而且在繼續擴大着兩次偉大的民衆戰爭，一次是太平天國戰爭，一次是一年前澎湃洶湧的紅軍戰爭。凡是稍爲熟悉太平天國的史實的人，都會知道太平天國的作戰，是慣用出奇制勝的戰略，來擊潰敵人。而多少年來紅軍的制勝國軍，差不多也是發展了這個戰略。爲着開發對日作戰的戰略，我們在這裏研究紅軍戰略的經驗是有必要的。

中國紅軍的應用運動戰的戰略，有它自己歷史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廣大民衆

爲着自己的利益，團結而效死於紅軍的周圍。正是因爲有了這樣的基礎——而且是紅軍所憑藉的惟一的基礎，所以，紅軍在戰爭中，一方面，可以布置少數的兵力於某方面的陣綫，這個少數的兵力，因爲有廣大的民衆掩護，最容易於佈成疑陣；國軍在民衆組織的嚴密狀態下，要偵查紅軍的虛實，本來是有「難於登天」之感的，而且紅軍在那陣綫，縱使只有最少數的兵力，因爲有羣衆的掩護，又最便利於施行一切的奇裝詭計，來迷惑國軍的判斷，而予國軍以打擊和巨創。國軍貿然向紅軍進攻，在一切事實上，本來都證明了只是死路一條，所以，即使國軍明知那裏只有少數的紅軍兵力，而因爲民衆到處都是他們的敵人，民衆能隨時隨地，大規模的有組織的來暗算他們，這樣也要大大地降低了他們進攻的自信心。另一方面，紅軍却正可以集中最大部分的力量，最決定的力量，在另一方面的陣綫上，在廣大民衆的掩護下，和各方面的陣綫協同動作，於適當的時機，不動聲色的，以迅雷疾風的姿態，出敵人的不意，攻敵人的不備，從敵人的側面或後方，給敵人以決定的突擊，而收到「殺敵效果。」在這裏，他們雖有最優良的武器，都不及發揮自己的威力，兩被繳械了。這種紅軍作戰的例子，差

不多是不勝枚舉的，紅軍從自己的政治上出發，採取了這種運動戰的戰略，無數次給了他們最大的創傷和潰敗。

德國的保皇黨名將塞克特，作了國軍的最高軍事顧問，這個反動將軍，雖然受了德國軍事學傳統的教育，雖則國軍有很多的新式武器，雖則國軍的武器優良於紅軍，不知有多少倍，可是他不能使國軍對紅軍作戰採取這種運動戰的戰略，因為事實上迫得這樣。赤區民衆普遍的覺醒，民衆普遍的組織，民衆普遍的武裝，使國軍無從深入紅軍的側面和後方來突擊紅軍。國軍的一切行動，都經過民衆的耳目，達到紅軍，爲紅軍所週知，而紅軍的一切行動，恰正相反，紅軍知道了國軍的一切，而國軍不知道紅軍的一切。國軍無從摸索紅軍的主力，無從摸索紅軍弱點，迫得國軍要去進攻盲目的作戰。國軍到一個地方的時候，紅軍運用運動戰的戰略，可以隨時分散兵力，個別作戰（化整爲另）也可以隨時集中兵力，來向他們襲擊（化另爲整）。轉眼之間，紅軍可以鴉雀無聲地個別掩伏起來，轉眼之間，又可以風馳電掣地集中出現。上述的這種情形，正可說明爲甚麼塞克特只能叫國軍採取所謂「穩扎穩打」的陣地戰，而不能採取運

動戰，然而「穩扎穩打」的陣地戰，是否真的可以擊敗紅軍的運動戰呢？事實是沒有，在紅國兩軍的任何戰役中，國軍沒有過一次某種決定程度的勝利。紅軍羅炳輝及蕭克所部的突圍，以及後來江西紅軍主力的突圍，以從事於抗日的北征，紅軍這種運動戰戰略的發揮，也正表現了塞克特那種陣地的薄弱。在另一方面，紅軍於運用運動戰的戰略外，同時，還能憑藉廣大人民的團結，進行勝利的陣地戰，事實上紅軍也是不斷的以陣地戰勝過國軍的。然而，這裏的問題，是在於目前中國紅軍陣地戰之決定的勝利，在軍事上，要依賴於貫徹運動戰的運用；特別是紅軍方面缺乏各種新式武器，在廣大民衆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出奇制勝」的運動戰，實是打擊和瓦解國軍一切新式武器的最有效的戰法。在這裏，運動戰不就是完全否定了陣地戰，而是陣地戰與運動戰，必要有靈巧的結合，依據當時具體的情態，運動戰與陣地戰能同時並用，而且運動戰在某種情態之下，可轉變為陣地戰，陣地戰在某種作戰的場合又可轉變為運動戰。在這裏，運動戰與陣地戰之靈巧的變更和配合，決定的方面，就在於運動戰。

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日作戰是採用了中國紅軍作戰的經驗的，一個學習軍事的朋友

曾告訴我說，他看到過十九路軍當時關於作戰佈置的一個小冊子，當時十九路軍作戰的佈置是這樣的：十九路軍當時只有三師軍隊，他們把一師放在正面陣線，而另一方面，則集中全軍三分之二的兵力，從敵人的側面和後方，進行包抄突擊。這種戰略，十九路軍在實際上，是從紅軍方面學來的，十九路軍的將領，曾公開指出了這點。而這種戰略，在軍事上，正決定了十九路軍的戰績。十九路軍怎樣能夠移用紅軍這種戰略呢？是因為當時上海的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所自動起來，而為人民所擁護的戰爭，是因為當時有廣大民衆可以掩護十九路軍的馳騁。在這點上，日軍則正處於完全相反的地位，因為上海的民衆都是日軍的敵人，這樣，使日軍作戰陷於很艱難的地位。日軍雖則有飛機，有大砲，然而終於遭受了一個月的挫敗。

可是十九路軍為甚麼又終於退出了淞滬呢？日軍在屢次挫敗之後，結果又從日本國內調來生力軍突然從瀏河方面來側擊十九路軍和上海民衆的陣線，迫得十九路軍從淞滬方面退却。這簡直是日軍運用了運動戰的戰略來挫折了十九路軍的運動戰。然而事實證明：十九路軍的受挫，在軍事上，決不是因為運動戰的戰略，而正是因為沒有

貫徹運動戰的戰略；一方面，十九路軍錯誤的指揮長官，並沒有堅決突擊敵人的後方，進行根本瓦解敵人基本陣地的決心和行動；日軍利用租界作根據地進入中國領土，來攻擊中國民衆和十九路軍，而中央政府和十九路軍將領却制止了士兵和民衆襲擊租界內的日軍，而且制止民衆和士兵乘戰勝之威，窮追敵軍到底，結果使日軍得有重新收集和重新調度的餘裕，來準備新的攻擊；另一方面，則那時人民的總動員和總武裝，沒有完全達到實現，而且又斷送了前方士兵一切的接濟，讓十九路軍士兵只得在一方面孤軍作戰，而讓那較有大量兵力的日軍，可以利用十九路軍的罅隙，來進行側面的突擊。

全國總動員，全民總武裝——這是中國人民對日作戰能夠得到最後勝利唯一的基礎，而且也是中國人民運用運動戰略來戰勝富有優良武器的日軍之唯一的基礎。人民總動員和人民總武裝越深入，越擴大，則中國人民就更容易利用自己的人 and 地利，和天時，在廣大人民有組成的行動掩護，和幫助之下，集中基本的力量，在決定的地點，在決定的時機（比如，利用黑夜的時機，利用敵人在行軍中沒有準備的時候，利

用敵人陣地未固的時候，利有敵人軍心動搖或疲憊不堪的時候，……總之決定的時機，首先要正確地估計當時政治形勢和戰爭條件的具體關係，而隨機應變地來抉擇之）進行決定的突擊，而取得勝利。飛機，大砲，坦克——日軍這一切的新的武器，在中國人民這種戰略前面，作用就要低落以致變成粉碎，而日軍在中國人民總動員和總武裝的澈底擴大和深入的狀態之下，要施行第二次的瀏河突擊，這種時機對於日軍是難找到的，即使日軍貿然進行這種第二次的瀏河突擊，而所得到的回答，必將是失敗的回答。

人民普遍的覺醒，普遍的組織，普遍的武裝，不但使中國人民對日作戰，可以進行勝利的運動戰，而且也可以進行勝利的陣地戰。在上海戰爭中，中國人民曾不但以運動戰戰勝敵人，而即使在陣地戰中，因為得到廣大人民的援助，還能夠有為，上海戰爭死守吳淞的參加者翁照垣將軍在一二八四週年時這樣寫道：

「我以孤軍困守吳淞，抵擋着敵人陸海空軍集中的火力，我和我的士兵，死守着我們的堡壘，我們並沒有被進步的物力所征服。我們的防線，一直到最後自動退却以

前，始終在我們的手中」。這是中國人民對日作戰陣地戰的一段描寫。

在長城戰爭中，著名的喜峯口之役，也是以陣地戰戰勝了日軍的。雖則敵人有最進步的武器，利用飛機，大砲和坦克，進行立體式殘酷的戰爭，而中國士兵以原始的大刀，却能在陣地戰中，表現了極大的威力，制勝了日軍，奪取了日軍最優良之武器。這裏就是在中國士兵民族的精神，而特別是廣大民衆的援助。在另一方面，無論在上海，在長城，對日陣地戰之勝利和支持，也正是由於這種陣地戰和運動戰的結合。關於上海戰爭我們已在上面敘述了，關於長城戰爭，我們知道，義勇軍和各地民衆，自發地，在日軍的側面和後方，或進行大規模的突擊，——運動戰，或進行散漫的遊擊戰，實是助長喜峯口陣地戰的勝利，而長城戰爭在戰略上最嚴重的錯誤，實是在於沒有把陣地戰自覺地展開爲運動戰；死板地死守陣地戰的戰略，來對付武器優良的敵軍，在軍事上來說，是一種愚昧，而且最後要陷於失敗的可能。至於長城戰爭最後失敗的覆轍，政治上的基本原因，和上海戰爭的覆轍，還是一個。

在對日戰爭中，我們必須強調運動戰的運用。在這裏我們所強調的運動戰的戰

和德國參謀部及國社黨所進行的運動戰戰略，基礎上不同，而戰略表現的形態，也不一樣；德國參謀部和國社黨的戰爭，是反動的掠奪的戰爭，對於這戰略運用的基礎是依賴於技術，依賴於新式的武器，而我們對日的戰爭，是進步的民族解放戰爭，對於這戰略運用的基礎，是依賴於人民普遍的覺醒，（人民的普遍組織，人民的普遍的武裝，依賴於組織最廣大的大眾戰，德國參謀部的戰略，只要對方能有更優勢的武器，就能被對方所戰勝，如對方是進步的勢力，這種戰略也正是沒有戰勝的前途）；而我們的戰略，如果對方不能消滅我們上述的基礎，我們就不能被對方所戰勝。我們有了上述的基礎，敵人也無從運用運動戰來打敗我們的運動戰，正如國軍的不能運用運動戰來打敗紅軍一樣。

不論在運動戰的場合，不論在陣地戰的場合，中國紅軍對於國軍，有了戰略的一個很大的優越。這就是中國紅軍的領導者於進行自己的主力戰之外，同時能在國軍的後方，組織民衆的武裝，或者進行民衆武裝的暴動，或者進行民衆的廣大遊擊戰爭，把大規模的遊擊戰和主力戰配合起來，這樣造成了國軍陷於沒有前方和後方之區別

的戰爭。國軍縱使有較優勢的兵力，優勢的武器，可是在這樣情形之下，却造成了處於四面受敵的孤立地位，造成了軍心的空虛，而紅軍雖弱可以勝強，雖少可以勝多，以至雖敗可以轉勝。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無疑地將要重新擴大排演紅軍這樣的歷史。日軍雖則正在利用中國的土地來和中國人民作戰，可是也正是因為這樣，使日軍在前方後方中國人民襲擊之下，陷於四方受敵的地位；日軍要擺脫這樣的地位，只有設法制止民族火焰的燃燒，可是日軍這個企圖，要依賴於中國人民救亡運動的展開狀態如何來決定。可是歷史必將擊碎日本帝國主義者這樣的幻想。

在日軍的後方，除了中國人民的反抗之外，日軍勞苦大眾以及高麗，琉球和台灣民族奴隸的叛亂，都正可與中國人民，進行前後的夾擊。日軍最大的致命傷，就是日軍的侵略戰爭不能進行大眾戰。不能進行動員大眾把所進行的戰爭看成自己生死的戰爭；而且要引起大眾以生死來反對這樣的戰爭。在這樣的情形下，日軍有限的兵力（而且還是隨時有倒戈的可能），當中國人民大眾戰及其戰略正確運用的前面，就只有慘敗的前途。

二 外綫戰與內綫戰

自從九一八以來，日帝國主義者已得在中國廣大的領土內，和中國人民作戰，而且日帝國主義者正準備在中國領土上作為進攻蘇聯作戰的根據地。就是在這點上，日帝國主義者，因藉着不抵抗主義和讓渡主義的我國過去對日政策之助得到了相當的外線作戰優勢，可是這只是一方面的看法，若就另一方面來觀察，顯然也就暴露了日軍最大的弱點。日軍的弱點就在這裏：日軍無論如何，不能阻止中國人民在日軍後方，組織對日作戰。在中國領土上作戰的日軍，不論其向着那方面的中國人民部隊作戰的時候，日軍的後方，隨時隨地都有被另一方面的中國人民及其部隊逆襲的危險，而這時候，在敵人的陣地後方，組織對日作戰，正是中國人民最能夠佔取的優勢。日軍雖則已經在中國領土內作戰，然而日軍卻不能在中國人民作戰的後方，來組織反對中國人民的作戰。不錯，有過民族叛賊，做過這樣的行動，以夾擊抗日軍（如李逆守信等的偽

軍擾亂），而且將來不可避免地還會做這樣的嘗試，可是這種民族叛賊的行動和嘗試，如果在人民總動員和人民總武裝的情形之下，必將遭最厲害的打擊而歸於消滅。只要在人民總動員和人民總武裝的情形之下，中國人民就可以實現最嚴密的步步爲營，節節爲寨，使日軍及民族叛賊，在中國人民完全沒有作亂活動之餘地。這樣，日軍線作戰的優勢，就要歸於消失，日軍由外線戰變爲內線戰，而中國人民則由內線戰變爲外線戰。換句話說，日軍的外線戰的優勢，却要被中國人民的外線戰優勢所代替。

同時，日軍還有自己內部的致命打擊，那就是我們前面所提過的，日軍內部和日本國內在中國人民的抵抗及其自己覺悟的前面，不可避免的叛亂，這樣子，日軍對中國人民作戰所已佔取的外線戰的開始優勢，也要被自己另一方面的劣勢所抵消。

，中國人民的由內線戰變爲外線戰的環境和前途，既如上述，可是也有人可以懷疑這一種可能。這種懷疑的人，可以舉出國軍過去在江西的碉堡公路政策，以及如意大利佔取阿比西尼亞土地的公路政策。我們可以擊破這種懷疑。就是碉堡公路的政策，老全不足以阻止中國人民革命抗日的外線作戰。惟一的問題，就是看我們在敵軍後方

動員羣衆，武裝羣衆的程度發展如何。動員羣衆武裝羣衆越普遍越深入，則所謂碉堡公路政策就不能發生些微的作用，而且敵人根本就無從進行這種政策，即使進行了這種政策，建築了若干碉堡，却要反轉而成爲被民衆擊殲的死地。不錯意軍在亞阿比西尼亞的碉堡公路政策，是發生過防禦阿軍進攻的若干作用的，然而這若干作用，不在乎碉堡公路本身，而在乎人民要求發展不平衡狀態存在的弱點，意軍利用了這個弱點，才能在碉堡公路身上，發生一些防禦阿軍的作用。

最廣泛地動員羣衆和武裝羣衆，在敵軍的後方，組成自己最堅固的民心碉堡，這是展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外綫作戰的道路；同時於內綫作戰的時候，用羣衆的威力來鞭退日軍，使日軍陷於前無進路，後無退路的被圍困狀態，逼迫日軍由外綫戰收縮爲內綫戰。中國人民這種由內綫戰變爲外綫戰的戰略，正足以保障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三 進攻戰與防禦戰

蘇聯軍事學家次非爾在其所著「步兵」一書中，關於進攻戰與防禦戰的問題寫道：

「防禦戰與進攻戰的本身過程，實現了對立的統一性——防禦與進攻的統一性。防禦戰是以積極的行動進行的，其本身則包含有反沖鋒，進而變為進攻的性；而進攻戰的本身，則包含後退而變為在相當的障地上作防禦的可能。不但如此，而且進行戰爭的情形，對於進攻戰與防禦戰，必將有密切的正確的聯系的理解，如果不理解此種聯系，則其失敗，必將成爲必然的趨勢」。

然而這裏，我們必然要明瞭的，這進攻戰和防禦戰之對立的統一，是以進攻戰爲主導的。防禦戰的佈置必須爲着進攻，防禦只是應作爲戰爭過程中進攻的一個某種必要的步驟，而不應只爲防禦而防禦；因爲防禦而防禦，其結果必陷於失敗。上海戰爭中國方面最後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爲軍事上層指揮者採取着「爲防禦而防禦」

的態度，等待敵軍進攻來進行防禦，而沒有堅決地從防禦的優勢轉變到進攻，當敵軍在前綫瓦解，退入租界的時候，中國軍隊並沒有進一步地追擊到底，發揮攻擊的威力，使敵軍無法收拾，而把自己的陣地爲新的進出，建立新的堡壘。事情却是相反；當敵人退却的時候，中國軍隊却也同時「鳴鼓收兵」。日軍在戰爭中，完全是處在主動的地位，而中國軍隊却完全處在被動的地位！日軍戰則戰，日軍休息則休息。中國軍隊只等着挨打。在這些戰略上，正是指示着中國軍隊最後要陷於失敗，長城戰爭的戰略，同樣地是走了同樣的覆轍。

瓦克里關於蘇聯的防禦戰問題，有了以下的一段話：「戰爭之政治的目的，必要極大的攻勢作戰。我們却將行防禦戰。這即是意味着：我們對於資本主義諸國的侵略，行着防禦。但那決不是意味着：從戰爭的開始，我們坐在國境以待敵。防禦的最好的方法，是在於進而殲滅敵人；而這不僅是軍隊，而是須舉全國度要廣大地積極行動」。（見波卡洛夫編的「科學的軍備與現代戰爭」）這段話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深省和效法。

在對日作戰中，從被動的地位轉變為主動的地位，從防禦的優勢轉變到進攻的攻擊，這是中國人民爭取戰爭最後勝利的戰略。然而這戰略之堅固的樹立，一方面必要依賴人民動員和武裝的普遍，實現真正大規模的大衆戰，另一方面必要依賴於革命力量在戰爭中，在軍隊中實際作戰的指揮權力的取得和堅強。歷史上證明：只有革命力量是最旺盛於進攻的攻擊的，然而最覺悟的革命力量，同時最會明瞭防禦在某個遭遇中爲進攻不可少的步驟，在適當的時候，施行防禦。正如一個偉人說過的，進攻的軍隊，必要「鞏固已被佔據的陣地，並依照已變化的戰局，重行佈置，……不顧慮一切，恃勇前進，實是進攻的死亡道路」。要使進攻戰與防禦戰得到最恰當的配合和聯系，而展開戰爭的全般勝利。革命力量在戰爭中，在軍隊中實際作戰的指揮權力的爭取，實有決定的作用。上海戰爭與長江戰爭的缺乏進攻與防禦的配合，中國軍隊在戰爭過程中的始終處於被動的狀態，一方面是因爲人民的動員和武裝的未進行，另一方面也正因爲是革命力量還沒有在軍隊中發揮實際作戰的指揮權力。

爭取戰爭的最後勝利，必要我們能夠操縱自如地來應付戰爭，迫得敵人的左右俯

仰，都要以我們的動作爲轉移；這就是說，我們對於戰爭的主動地位。我要戰，叫敵人不能不戰，我要休息，叫敵人不能不休息；我要叫敵人到東，敵人就不能不到東，我要叫敵人到西，敵人就不能不到西。在這裏，也就是我們必要對於進攻戰與防禦戰能予以恰當的配合及其恰當的互相轉變。

中國人民對日戰爭的進攻戰和防禦戰的戰略之最巧妙的配合和互相轉變，我們不厭煩重複地說，這必要以大衆戰爲基礎，而且只有以大衆戰爲基礎，中國人民才能進行這種最巧妙的配合和互相轉變。革命力量之實際作戰指揮權力的領導所發揮的對於戰爭的決定作用，亦正是建立在大衆戰的基礎上面的。

在日軍方面，如果日軍是在中國人民發揮盡的大衆戰的前面，如果日軍是處在中國廣大人動員所包圍的鐵桶中，那末，日軍對於進攻戰和防禦戰之自由的運用，就要得到最大的困難，而且將令被追到只能採取防禦戰的戰略，這樣日軍作戰也就將被迫而處於被動地位，造成日軍作戰一般的劣勢，並且，由於日軍作戰和日本大衆利益的背道而馳，在中國人民堅決抵抗的前面，日軍正是缺少着發揮進攻戰精神之基礎的

，這同樣的是日軍戰略最大的弱點。

時的情勢，就要變成爲消耗戰的性質。

在消耗戰的場合，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結果又將如何呢？

日軍和中國人民作戰，其所能繼續的時間，要以日軍的人力和物質力的支持程度來決定。第一，正如我們上面不斷地述說，而爲歷史所證明的：只要中國人民屹立越持久，越擴大，則日本社會內部，越易引起騷擾和叛亂，日軍也就越不容易支持，日軍作戰也愈受挫，以及死亡的愈增加，必將愈增加日軍人力補充的困難；四年以來，日帝國主義者和中國人民的戰爭，如上海戰爭，如東北義軍戰爭，如長城戰爭，特別如上海戰爭，作戰僅僅一個月時間，日本全國就馬上起了很大的震動和騷動，士兵起了極大的動搖，如果不中斷上海民衆作戰各方面和各種類的接濟，不截阻人民的總動員和總武裝，不是作戰實際指揮者的軟弱和錯誤，上海戰爭只要再持久下去，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日軍人力的消耗與其補充的困難，就會使日軍結局陷於一敗塗地。可是中國人民對日作戰，在這方面，則是完全佔取優越的地位，中國人民爲着爭取民族的生存，在人民總動員和總武裝的情形之下，必將視死如歸而前仆後繼。中國人民絕不

憂慮作戰人力補充的困難，而且民族革命戰爭越普遍，越深入，則人力的結集越迅速越有力。第二，日帝國主義者國內的富源很薄弱，特別為日軍優越軍器和作戰所需要的各種物質原料，如鋼鐵，煤，煤油，棉花，以至於糧食，都要依賴於國外的供給，特別是依賴於在中國的掠奪，如果戰爭持久下去，中國人民進行着普遍的對日作戰，那末，日帝國主義者這些接濟都將會被截斷，而無法補充。可是中國人民對日作戰，在這方面，又有不同，中國人民可以從對日作戰的勝利中，獲得自己一部份武器的補充，同時可以在勝利的區域中，組織鞏固根據地，進行自己的製造，而且又可從國際的同情中，獲得援助，在糧食的供給問題上，中國人民因為可以得到自己廣大人民的供給，這又是日軍所望塵莫及的。

消耗戰是制日軍死命而有利於中國人民方面，既如上邊，那末，日軍是否「將殲滅戰來解決和中國人民的戰爭呢？這個回答是不可能的。事實勝雄辯，那末，四年來的東北人民抗日作戰之不斷繼續和擴大，就是一個極大的雄辯。其所以是不可能的，就是因為中國人民爭取自己民族生存所進行的大眾對日作戰，問題一日不解決，則

中國人民的生活即一日不解決，而對日作戰即一日不終止。這裏失敗了，那裏再起來，今天失敗了，明天再起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日軍企圖進行殲滅戰來解決戰爭，這是一件徒勞無功的事情。反之中國人民却可結合殲滅戰來解決戰爭，最後地戰勝日軍。中國人民的大衆戰，最適宜於將日軍爲包圍的突擊，而進行殲滅戰，如上所說。日戰爭，會給我們以很光輝的例子，而中國人民對日戰爭的消耗戰，必將歸結爲殲滅戰。消耗戰不斷地轉變爲殲滅戰；而因爲日帝國主義者之不斷的多方面的進攻，戰爭勢將波及極大的範圍，而自會陷於長期繼續的可能。所以，這一殲滅戰的終結，或又轉變爲新的殲滅戰，或又轉變爲那個消耗戰的開始。在長期的消耗戰過程中，積集過無數的殲滅戰，在最後的殲滅戰過程中，積集過無數的消耗戰。中國紅軍平日的作戰，曾經很靈巧地運用了殲滅戰與消耗戰的結合：一方面運用主力，進行迅雷不及掩耳的殲滅戰的攻擊，另一方面，又進行堅壁清野和散漫的遊擊戰，來坐困國軍，消耗他們的兵力和物力。中國紅軍往日的作戰，不但證明殲滅戰與消耗戰的互相轉變，而又證明了殲滅戰與消耗戰的可以在一個作戰階段上同時並存，殲滅戰與消耗戰這種戰

略之巧妙的運用，這是中國人民大眾戰勝日帝國主義者的地方，而使日帝國主義者最後時歸於一致殲滅戰。

在一八八八年恩格斯寫給佐爾格的一封信，描寫了資本主義國度間將要進行的侵略大戰，有以下的話：「……戰爭將要長期繼續，不但如此，要把敵國一舉撲滅也不可能的。在人民之中，要課以空前的重荷，而且大決戰，會引起同歸於盡的潰滅」。這句話，在目前，不是可以作為日帝國主義者侵略戰爭之命運的描寫嗎？

結 論

由於上面各部分戰略的分析，證明着中國人民依其自覺對日作戰路上的優越，日帝國主義者雖則有着飛機大砲，坦克車等優越的武器，可是却不能拋開日本人民和戰路而作戰。可是在這些戰略上，日帝國主義者不可避免地屈伏在中國人民的前面。

中國人民高舉着民族革命戰爭的旗幟。使日帝國主義者顛慄在中國人民民族革命作戰的前面吧，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中國人民的。